

贵州民族科学研究院丛书

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与政策在贵州的实践丛书之六



贵州民族 研究六十年

GUIZHOU MINZU
YANJIU LIUSHINIAN

陈玉平 龚德全 编著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贵州民族科学研究院丛书

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与政策在贵州的实践丛书之六

贵州民族

研究六十年

GUIZHOU MINZU

YANJIU LIUSHINIAN

陈玉平 龚德全 编著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贵州民族研究六十年 / 陈玉平, 龚德全编著.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1. 7

(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与政策在贵州的实践丛书 /
贵州民族科学研究院丛书)

ISBN 978-7-5647-0870-2

I. ①贵… II. ①陈… ②龚… III. ①民族学—研究
—贵州省 IV. ①K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10250 号

贵州民族科学研究院丛书

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与政策在贵州的实践丛书之六

贵州民族研究六十年

陈玉平 龚德全 编著

出 版: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成都市一环路东一段 159 号电子信息产业大厦 邮编: 610051)

策划编辑: 万晓桐

责任编辑: 万晓桐

主 页: www.uestcp.com.cn

电子邮箱: uestcp@uestcp.com.cn

发 行: 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四川墨池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85mm×260mm 印张 7 字数 17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1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47-0870-2

定 价: 25.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本社发行部电话: 028-83202463; 本社邮购电话: 028-83208003。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 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与政策在贵州的实践丛书》

编委会

主 编 杨昌儒

副主编 石开忠（常务） 李平凡 陈玉平 龙耀宏

颜 勇

顾 问 郝桂华 高万能 吴大华 黄 平

编委会

主 任 徐 飞

副主任 杨昌儒

委 员 石开忠 李平凡 陈玉平 龙耀宏 颜 勇

序

现代政党执政，无论在哪个领域，都须有理论的支撑。而任何理论，在实践中，都有一个不断丰富、发展、完善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在贵州甚至于全国的实践，都证明了这一历史的真理。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构成的国家，由于少数民族分布地域广，人口多，历代统治者都必须高度重视这一特殊的国情，方能有效治理国家。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伟大的政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特征，不断总结经验，不断调整政策，使民族理论政策日臻完善。从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时期到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较好地处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族关系，为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提供了重要保障。

今天，我们认真回顾和总结中国共产党在处理民族关系中从理论到实践的历史进程，把握不同领域不同时期的工作特征，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构建和谐社会、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贵州民族事务委员会与贵州民族学院在 2005 年共同组建的贵州民族科学研究院，首先对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在贵州的实践这一重大课题展开研究，组织了众多专家学者，从区域自治、人口政策、经济工作、民族工作、民族语言文字、宗教、民族文化、民族教育、民族传统体育、民族医药卫生等十个方面多角度、宽领域讨论了不同时期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在指导贵州革命与建设的利与弊、得与失。以广阔的贵州历史为背景，厘清了历代统治者民族政策的经验教训，在这一基础上彰显了党的民族理论的光辉、政策的伟大。

贵州的历史告诉我们，历届中共省委、省人民政府在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指导下，结合贵州实际，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带领全省各族人民极大地推进了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为贵州各民族的和谐发展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功不可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贵州历史的写照。

感谢贵州民族学院的各位专家，是你们在百忙之中，为此书的出版倾注了大量心血，感谢主编杨昌儒同志对此书的悉心指导和安排，我愿与你们一道继续为贵州民族事业的发展，为贵州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是为序。

徐 飞

二〇一一年元月八日

执政为民的一种诠释

《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与政策在贵州的实践丛书》总序

2005年，贵州民族学院与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姻的一个成果——贵州民族科学研究院成立。学校命我出任院长，当我和黄平副主任走上主席台，从吴嘉甫副省长的手上接过贵州民族科学研究院的牌匾时，面对幽深的摄影镜头，我感觉到其间的分量与责任。郝桂华主任对民族科学研究院寄予很大的希望，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与民族科学研究院班子成员座谈。黄平副主任多次带着李平凡所长、颜勇主编到贵州民族学院商讨科学研究事宜。

根据郝桂华主任的指示精神，我们在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出版的《贵州民族工作五十年》编辑思路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在贵州的实践”的研究意向。黄平副主任在听取我们的汇报之后，充分肯定了该课题的研究意义，并要求民族科学研究院提出详细的研究大纲。我们把丛书的大纲提交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办公会议，与会的领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就研究工作的宗旨、原则作了具体的指示，对研究应达到的目标提出了明确的要求。2008年徐飞副主任分管此项工作后，多次听取民族科学研究院的汇报，并指示我们再对大纲进行一次认真的思考，力争出精品。根据徐飞副主任的意见，我们曾试图将丛书改为一本书，在反复磋商之后，感觉到用一本书的篇幅很难完成对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贵州的民族工作实践的梳理，只好又回到丛书的编写体例中来。通过这样反复的研究之后，我们对原来的大纲进行了修改，形成了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个丛书体例。

为了确保研究工作有序开展，我们组建了丛书编辑委员会，下设学术委员会和联络协调办公室。大概因为我是民族科学研究院院长的缘故，大家推我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丛书主编，学术委员会成员由杨昌儒、石开忠、李平凡、颜勇、龙耀宏等组成，石开忠博士学成归来，担任民族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自然也就是本丛书的主要策划人和联络协调办公室的主任了。

研究工作是采取课题负责人制度展开的，由有相关专题研究旨趣且有一定研究成果的专家自愿报名，学术委员会审定，明确课题负责人，然后由课题负责人自行组织研究班子。这些课题是：“贵州民族区域自治研究”“贵州民族人口政策研究”“贵州民族研究工作研究”“贵州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研究”“贵州民族识别工作研究”“贵州民族教育研究”“贵州民族经济工作研究”“贵州民族宗教工作研究”“贵州民族文化工作研究”“贵州民族传统体育工作研究”“贵州民族医药卫生工作研究”。各专题的同志们起早贪黑、日以继夜地工作，在各大图书馆和网络图书馆之间奔波，一些专题的学者还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调查，成就了这套《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与政策在贵州的实践丛书》的出版。

因为第九届少数民族运动会将在贵州举行，我们试图把这套丛书作为献礼。如果社会各界人士，尤其是国内同行们能够关注本丛书，并认为是一种礼品，那将是我们贵州省民族学界的荣幸。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显然，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的实践性就成为其首要的特点。因此，回望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在贵州的实践，讨论其利与弊、得与失，对于丰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和进一步做好贵州省的民族工作具有积极的意义。这也是我们在策划本丛书时的旨趣所在，我们要求各专题在描述事件发展进程时，要用学理的眼光去审视历史，不回避问题，并尽可能地分析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如果说需要说明专题的特色，我想，这就是本丛书的特色。相信本丛书出版后能够引起有关领导和部门的重视，产生应有的效果。

回望中国共产党在贵州执政以来的历程，我们惊叹民族理论的魅力。在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指导下，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正确贯彻执行民族政策，各民族干部群众齐心协力，以不懈的努力推进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努力缩小与先进发达地区的差距。贵州省 18 个世居民族都从各自的起点上，大踏步地前进，各民族空前团结，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虽然横向比较贵州仍然处于“欠发达、欠开发”状态，但人民生活一天比一天好，可谓是“芝麻开花节节高”，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我在贵州民族学院从事民族理论的教学与研究近 30 年，以往只是针对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做过专题研究，如此全面而又系统地梳理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在贵州的实践过程，尚为初次尝试。此次承担如此重大的使命，感受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在实践工作层面的浸润并发挥其指导作用的过程，对于提高自身的学术修养，当是有幸之至。身为本丛书的主编，写下这些文字权且作丛书来历的一个交代。今后，我将与同行们以及我的学生们一道，继续探讨贵州的民族问题，为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为民族平等与团结鼓与呼。

是为序。

杨昌儒

2010 年 3 月 20 日于花溪河畔觉悟斋

前 言

贵州这片美丽而神奇的土地，曾被许多民族学者誉为民族学研究的“黄金宝地”，之所以会有如此美誉，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则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省份，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异常丰富。据《贵州省志·民族志》中所载录的数据，贵州现有民族成分 49 个，其中，汉族、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彝族、仡佬族、水族、回族、白族、瑶族、壮族、畲族、毛南族、蒙古族、仫佬族、满族、羌族为贵州的世居民族。这些不同的民族都保有自己不同的文化特质，它们共同构成了贵州民族文化的绚丽景观。二则贵州在历史上较少受到各种外来干扰，又有巨岭恶瘴作自然壁垒，加之地处荆楚、巴蜀文化的交汇地带，成为古老华夏文化的天然储存地、多种地域文化的沉积带，因此，留下了很多古老文化的活形态。正是这些缘由，才吸引了众多人类学家在贵州的田野践履，从而不断地拓宽与延展了贵州民族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回溯历史，贵州民族学研究始于 20 世纪初，到今天，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在这近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贵州民族学研究，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如果按时间的脉络进行划分，我们大致可以将整个贵州民族学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的民族学研究，这是贵州民族研究的起步阶段，也是贵州民族研究理论的基本建构阶段。第二阶段的起止时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到改革开放以前，这是贵州民族研究的大发展阶段。在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政策的正确引导下，贵州民族研究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在此阶段，广泛调查了贵州省境内各少数民族的基本历史、民俗风情以及社会状况等。第三阶段为改革开放至今。面对经济全球化和社会发展现代化的新形势，贵州的民族学研究也积极融入学术发展的新场域，广泛涉及贵州民族学研究的新问题、新论域，从而使贵州民族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毫无疑问，贵州的民族学研究是伴随着新中国六十年的步履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是在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政策的正确指引下而取得辉煌成就的。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年后，回溯贵州民族研究的发展历程，梳理其理论与实践探索脉络，从而展望贵州民族研究的未来发展态势，这对于整个贵州民族学研究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为此，我们希望通过本书，回顾、反思和总结贵州民族研究的总体情貌，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贵州民族研究的情貌。

本书除去序、前言、附录，共有八个部分，分别为：20 世纪前半叶的贵州民族研究；20 世纪 50 年代贵州社会历史调查；“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编撰与修订；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贵州省（州、县）民族志编撰；贵州民族历史研究；民族学理论及相关学科的研究；贵州民族研究的现状。需要说明的是，这八个主体部分并非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而是以主题的逻辑顺序为线索，但每一个主体部分内部则是按时间顺序进行梳理的。

贵州民族研究所涉及的范围很广，加之本书只是“丛书”之一，其他书所讨论的内容则不详论，这些内容包括：贵州民族区域自治、贵州民族经济、贵州民族人口、贵州民族教育、

贵州民族体育、贵州民族医药卫生、贵州民族文化、贵州民族语言、贵州民族识别、贵州民族宗教研究。本书着重于从民族学（人类学）在贵州近六十年的发展进行综合论述，如：贵州的民族调查、贵州单一民族研究、贵州民族研究中所采用的理论与方法等。

由于贵州民族研究的范围在不断扩展，尤其是一些边缘性学科或交叉性学科在贵州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如民族法学、生态人类学、民族政策学、民族旅游学、生态博物馆学等。本书只是对贵州六十年来民族研究作粗线条的勾勒，但我们力图呈现贵州民族研究取得的成绩，贵州民族研究的发展脉络，贵州学者对相关理论问题的探讨，贵州民族研究的学者队伍、机构设置、人才培养、学术刊物等方面的情况。如果将贵州民族研究的调查与理论研究相对比，显然，前一方面成果更突出。或者说这是贵州民族研究的一大亮点和特色。但贵州有众多的少数民族，民族分布也较复杂，文化上呈现多样性。所以贵州学者的民族调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在理论研究方面贵州学者虽然不占优势，但有些学者的探讨却也是有价值的。

作为中国民族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贵州民族研究为中国民族学研究的理论跟进与实践探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同时，她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也是中国民族学在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政策引导下大繁荣、大发展的真实写照。我们希望通过回顾贵州六十年来民族研究的历程，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以便为今后贵州民族研究得到更好的发展作出贡献。以使贵州民族研究更符合学科规范，同时也更具有创新性，使之对中国民族学研究乃至世界民族学的研究发挥更大的推动作用。

目 录

第一部分 20 世纪前半叶贵州民族研究回顾	1
一、国外学者对贵州民族的初步研究	1
二、国内学者对贵州民族的初步研究	3
三、20 世纪上半叶贵州民族研究的学术史意义	9
第二部分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贵州民族调查与研究	11
一、中央及省民族访问团对贵州民族的调查	11
二、民族识别工作的开展	13
三、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16
四、贵州民族语言调查及推广	19
五、贵州民族经济调查	22
六、民间文化遗产的搜集与整理	22
第三部分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编撰与修订	24
一、任务和完成情况	24
二、编写过程述略	25
三、学术意义与成功经验	29
第四部分 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	33
一、缘起与基本情况	33
二、丰硕的调查研究成果	36
三、学术反响与意义	37
第五部分 贵州民族历史研究	40
一、贵州民族历史的综合性研究	40
二、贵州各民族族源研究	43
三、贵州民族关系史研究	46
第六部分 民族学理论及相关学科研究	48
一、贵州的单一民族研究	48
二、生态博物馆研究	52
三、民族法学研究	55
四、旅游民族学及民族旅游开发研究	58

五、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	63
六、侗戏侗文化研究	64
七、贵州本土文化研究	66
八、其他相关理论研究	67
第七部分 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70
一、学术访问与考察	70
二、贵州民族研究的“他者”视角	76
三、回顾与反思	80
第八部分 研究机构与人才培养	82
一、民族研究机构	82
二、学术团体	83
三、贵州民族研究的相关刊物	86
四、人才培养	89
结束语	91
参考文献	93
中文著作（音序）	93
翻译文献	95
期刊	95

第一部分 20 世纪前半叶贵州民族研究回顾

在贵州民族学研究的百年历程中,20 世纪前半叶的研究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虽然它只是一个起步阶段,却奠定了贵州民族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开拓了贵州民族学研究的诸多实践领域。从 20 世纪初开始,众多的中外人类学、民族学者就深入贵州山区,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田野调查,且到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逐渐形成了一个高潮,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直到今天,这些研究成果都是我们进行贵州民族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因此,从学术发展的延续性来看,二十世纪前半叶的贵州民族学研究,是我们无法忽略的一个重要阶段。

一、国外学者对贵州民族的初步研究

国外学者对贵州的民族学研究开始得比较早。自 20 世纪初往后的四十多年里,曾有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的民族学者来到贵州省,对全省的诸少数民族进行了实地田野调查,并于调查后,写就诸多著作。这些著作主要有:伊特金斯《苗族记》(The Miao—Tze Tribes),荷沙《华西三年驻节记》(Three Years in Western China),派尔克《溯扬子而上》(Up The Yangtze),达维拉《罗罗与苗子》(Les lolos et les miao—Tze),克拉克《贵州云南省志》(Kweichow and Yunnan Provinces),洛克哈特《中国苗蛮记》(On The Miaotze Or Abajsnjes of China),威廉《中部王国》(The Middle Kingdom),克拉克《中国西南部之部落》(Among The Tribes in South West China)。^①美国学者米凯在贵州贵定、龙里一带苗族地区进行过人类学考察。

德国女人类学家鲍克兰于 20 世纪 40 年代到贵州苗族、仡佬族地区进行民族调查,并搜集了部分文物资料。其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贵州的铜鼓》《贵州仡佬的历史和现状》《贵州安顺普定诸县之仡佬及其历史》。

应该说,上述这些研究著作的学术影响力较小。真正从人类学、民族学意义上对贵州民族进行调查的研究者当推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他也是第一个来到贵州进行民族学调查的国外人类学家。1902 年 7 月至 1903 年 3 月间,鸟居受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之派遣,对我国西南部的少数民族进行调查。鸟居此行,历经七个半月之久,路经今中国西南地区九个省(市),行程万余里。其中,在贵州、云南、四川的调查旅行时间最长,共有四个半月。《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之行》一书即是此次调查的成果。

鸟居是于 1902 年 10 月 5 日由湘入黔的。当时贵州的交通、地理条件异常艰苦,且常有土匪出没,鸟居最终克服重重困难,自东向西横穿了贵州全境。他首先经今湖南芷江、新晃进入贵州玉屏;再经羊坪、青溪、镇远、施秉、黄平、重安江、清平、贵定,于 10 月 17

① 参见岑家梧:《贵州民族研究述略》,载《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127 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

日到贵阳；先后在贵阳附近的青岩、惠水、清镇一带苗族、布依族村寨调查了13天；再从清镇经平坝到安顺，并在安顺附近的旧寨等苗族村寨调查了4天；11月5日，从安顺到镇宁，考察了关岭县红岩山的古文字；后经关索岭到郎岱，并在郎岱县城附近的苗族、布依族村落调查；又经打铁关、毛口驿、阿都、花贡、刘官屯等地，于11月15日由胜境关进入云南省富源县。

虽然鸟居在贵州境内的田野调查时间仅有40天，但所到之处，他对当地的地名、地势、土壤、植被情况以及各民族的民俗风情、文化形态等都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并进行了人体测量、考古调查，因而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回国后，鸟居先后发表了与贵州民族文化相关的文章共27篇，另外还有3本书的11个章（节）也专门论述了贵州民族的历史文化。他对贵州民族文化的著述，涉及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民俗学、地理学和旅游学等多学科内容，真实地反映了贵州民族文化在百年前的历史面貌。下面我们略举几项鸟居在贵州的调查研究成果，以示说明。

1902年10月18日至30日，鸟居在贵阳附近作调查时，随身带走了一面铜鼓，两年后，他在日本《考古界》杂志第四篇第二号上以《关于我带回的一面铜鼓》为题，对中国铜鼓进行了全面的比较研究。1902年11月6日，他特地考察了今关岭县红岩山上的古文字，又专门写了《红岩山上的古代文字和彝族的关系》一文。1906年出版的《苗族调查报告》一书，可视为鸟居在中国西南地区（主要是贵州）调查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全书共十章，分别为：一、旅行日记；二、苗族之文献；三、苗族之名称区别及其地理分布与神话；四、苗族之体质；五、苗族之语言；六、苗族之土俗及土司；七、苗族之花纹；八、苗族之笙；九、铜鼓；十、结论。^①该书于1936年经上海国立编译馆翻译出版后，立刻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强烈反响，并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初期，掀起了以“苗学”为主的“黔学”和“西南学”的讨论热潮。1945年，任可澄总纂的民国《贵州通志》也曾多处引用鸟居龙藏的《苗族调查报告》一书。

此外，1907年出版的《彝族的体质》一书，是鸟居在贵州进行体质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著作。他于1926年发表的旅行日记——《从人类学上看中国西南》，如实地记录了世居我国西南的侗族、苗族、布依族、彝族、傈僳族、藏族等少数民族和明代进入贵州的汉族——“凤头鸡（筭）”“里民子”的生活文化实态。这部旅行日记，是外国人深入中国内地，用科学的方法记录各民族生活文化实态的较早的著作之一，给人类学者、民族学者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对调查地进行文字记录以外，鸟居还在贵州拍摄了170余张照片，经1990年整理保存下了108张。在这些照片中，既有苗族、布依族等诸多少数民族村落、服饰、织布等照片资料，也提供了贵州省黄果树大瀑布、历史文化名城镇远、青岩古镇等在历史上的最早影像记录，因而，具有十分珍贵的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此外，他还在贵州收集了16件民族民间文物，现藏于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等处。

统而述之，鸟居龙藏是国际上对贵州民族文化著述最多、拍摄历史照片最多的一位外籍学者。他的中国贵州乃至西南之行，不仅成为他个人学术生涯的转折点，并构成了“鸟居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中国西南民族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对“黔学”理论的进一步建构，都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江应梁先生就曾指出鸟居的田野调查显示了“一种科学的研究方

① [日]鸟居龙藏著，国立编译馆译：《苗族调查报告》，国立编译馆，1936。

法”^①；岑家梧先生也曾认为：“黔省民族正式作人类学上之调查者当推日人鸟居龙藏”，“鸟居之著作，可视为黔省民族研究之第一部科学著作”。^②岑家梧教授还在鸟居有关著述之基础上，阐述了建立“西南学”和“中国民族学”的观念。由此可见，鸟居研究在贵州民族学乃至中国民族学发展中的作用非同一般。

二、国内学者对贵州民族的初步研究

20世纪上半叶，由于社会、历史等诸多原因，西南边疆诸省成为中国民族学调查的重点区域。由于贵州省少数民族众多，且在抗战时期成为重要的后方战略基地，因此，人们对贵州境内的诸多少数民族进行调查、研究也逐渐形成热潮。这些调查可以分为：民国政府组织的官方调查（包括由政府自上而下组织的调查和政府研究机构开展的调查）、学术团体的调查以及学者个人的调查三类。

1. 民国政府对贵州少数民族的调查

从1929年12月开始，民国政府自上而下对贵州少数民族开展了八次调查。这八次调查可分为如下四类：（一）关于贵州土司情况的调查。此类调查分别于1929年和1939年由民国政府内政部执行。（二）对贵州少数民族基本情况的调查。主要有1934年的“西南苗夷民族调查”和1938年的“西南边区民族调查”。（三）关于贵州少数民族人口的调查。民国政府于1947年两次对贵州少数民族人口数进行了调查。（四）关于贵州少数民族生活状况的调查。这类调查有1947年的“边疆民族及内地生活习惯特殊国民状况调查”和1948年“边区各民族生活状况调查”。^③这八次调查，都是由民国政府自上而下官方组织的民族调查。其调查内容涉及了贵州民族的名称、分布地区、人口数目、教育情况、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民族源流及土司情况等诸多方面。

除了由民国政府组织的民族调查外，还有隶属于贵州省政府的研究机构也对省内诸多少数民族进行了调查研究。这样的研究机构主要有：贵州省教育厅的“民俗研究会”和贵州省政府组织的“边胞文化研究会”。1938年6月，贵州省教育厅以“调查研究省内各地民俗与方言，便利各种教育及文化实施为宗旨”^④，特设立民俗研究会。1939年初，民俗研究会委托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搜集各县的苗族、彝族等民族民俗资料，经过前后半年分赴各地的调查，研究者汇齐所搜集资料缴送民俗研究会。^⑤

1945年10月，贵州省政府“为适应环境，促进边胞文化，特于省政府下设立边胞文化研究会，聘派专人负责，研究改进，出版刊物”。^⑥边胞文化研究会发行有《边铎旬刊》和《边铎月刊》两种刊物，并定期辑印边疆文化丛书。从1945~1948年，贵州边胞文化研究会先

① 江应梁：《评鸟居龙藏〈苗族调查报告〉》，载《现代史学》，第三卷，第二期。

② 岑家梧：《贵州民族研究述略》，载《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132。

③ 参见马玉华：《试论民国政府对贵州少数民族的调查》，载《贵州民族研究》，2005（2）。

④ 贵州省档案馆：《贵州社会组织概览（1911—1949）》，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245。

⑤ 参见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234。

⑥ 《贵州边胞文化研究会述要》，载《边铎月刊》，1948（1）。

贵州民族研究六十年

后组织了对台江、镇宁、望谟、荔波、平越、威宁、施秉等县少数民族的调查，出版了《台江边胞生活概述》《镇宁县边胞概况》《望谟县边胞概况》《平越县边胞概况》《威宁县边胞概况》《施秉县边胞概况》等调查报告，均发表在《边铎月刊》上。^①

民国政府对贵州少数民族所进行的一系列调查，不但种类繁多、内容丰富，而且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它采用了西方科学的调查方法。每次调查都有很强的针对性、目的性，且在调查前认真制定调查表式、附有填表说明、须知和要求，这样就基本保证了调查资料的可靠性。这些数据资料为当时的国民政府制定边疆政策与开发计划提供了参考依据，就今天而言，对于我们全面了解民国时期贵州少数民族状况和研究贵州少数民族发展历史也同样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民国政府的贵州少数民族调查也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例如调查过程中表现出了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的倾向，而且，调查者也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对贵州少数民族没有按照语言系统进行科学的分类，从而导致了民族名称繁杂，种类繁多。

2. 学术团体对贵州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许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迁入西南地区，从而使西南边疆成为中国民族学研究的重要阵地。1938年上半年，大夏大学由上海迁至贵阳，并成立了“社会经济研究室”，附属于文学院，主要开展社会科学的调查研究工作。翌年春，在原来的“社会经济研究室”之基础上，“为促进工作效能，充实内容设备”^②，决定更名为“社会研究部”，其核心任务就是对贵州诸少数民族“从事进行有系统之研究，以冀促成贵州社会建设之事业”，“特别着重黔省境内苗夷生活之实地调查工作。”^③

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在吴泽霖主任、陈国钧副主任的主持领导下，制定了详细周密的调查计划与大纲，并结合上级有关部门的要求内容，派遣教授、研究人员和学生分赴贵州各少数民族地区，开展了多项卓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藉以引起国人研究苗夷问题之兴趣，并以供政府与关心苗夷社会人士之参考，而期苗夷教育、苗夷生活、苗夷卫生、苗夷训练等能获进一步之改善。”^④

1939年春天，刚刚成立的“社会研究部”就受民国政府内政部的委托，派调查人员分别前往安顺、定番（今惠水）、炉山（今凯里）等地进行了为期八个月的调查。并将调查材料编成《安顺县苗夷调查报告书》《炉山县苗夷调查报告书》《定番县苗夷调查报告书》，呈报内政部。每种约20万字，内容十分翔实。这些调查材料对于今天的贵州民族历史、文化研究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同年，社会研究部还受到贵州省教育厅民俗研究会的委托，负责搜集各县苗族、彝族等民族民俗资料。调查人员分赴各地认真调查，历时半年之久，最后将调查材料汇总送交民俗研究会。1940年春，由于贵州省政府组织边远农村工作

① 参见马玉华：《试论民国政府对贵州少数民族的调查》，载《贵州民族研究》，2005（2）。

② 陈国钧：《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工作述要》，载吴泽霖、陈国钧等著：《贵州苗夷社会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269。

③ 陈国钧：《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工作述要》，载《贵州苗夷社会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269。

④ 王伯群：《贵州苗夷社会研究丛刊序》，载吴泽霖、陈国钧等著：《贵州苗夷社会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1。

宣传团，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又受贵州省民政厅的委托，调查各县的苗族、彝族等社会状况，派出两名助理研究员随团从东路和西路分别赴地处边远的苗夷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调查了五个月，最后将调查报告呈报给民政厅。

在1940年3月至1941年4月的一年又一个月时间里，社会研究部分别对黔东南的八寨（丹寨、三合）、都江（三都）、荔波、下江（从江）、榕江、黎平；广西三江、融县、罗城各县的少数民族生活状况进行了详细调查，并编辑了《贵州省东南边陲县黑苗、生苗、侗家、水家生活调查资料》。1942年春，社会研究部又对贵州西南北盘江流域各县少数民族状况进行了调查，为期三个月，并整理成《北盘江流域少数民族状况调查报告》。

除对贵州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民俗等内容进行翔实调查外，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还对贵州各少数民族的语言状况进行了实地调查。这方面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了1940年春至1942年冬这三年时间里，社会研究部分别对威宁、贞丰、八寨（丹寨）、炉山（凯里）、贵阳、安顺、青岩、荔波、榕江、松桃等地各少数民族语言状况进行了调查，并整理成《威宁大花苗语》《贞丰仲家语》《八寨黑苗语》《炉山黑苗语》《贵阳仲家语》《青岩白苗语》《安顺青苗语》《荔波水家语》《榕江侗家语》《松桃红苗语》等调查报告，总计有数十万字。

在实地、系统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大夏大学积极编印、出版了多种学术资料、图书。早在迁黔之初，“社会经济研究室”就在吴泽霖教授的主持下，组织广大师生进行过社会学方面的调查。如贵阳“二四”灾情调查、贵阳城区劳工概况调查以及贵州省教育调查、社区调查、贵阳劳动人口结构调查等，还指导本校黔籍学生调查贵州各县的民风民俗。在这些社会学调查之基础上，先后编就了《定番县乡土教材》四十卷四十万字、《望亨镇社区研究》十万字、《贵州劳动人口结构之研究》三万字、《黔垣二·四日机轰炸灾情调查》三万字以及《贵州各县风俗迷信调查》《贵阳城区劳工概况初步调查》等。

“社会研究部”成立后，随着研究人员的增多，研究经费的增加，编印、出版的资料、图书就更多了。在编撰资料、调查报告方面就有二十多种，其内容涉及少数民族社会状况、语言、民俗、生活等诸多方面。在论文撰写和发表方面，社会研究部编辑有《社会旬刊》40期，发表论文、资料数十篇，编辑了《社会研究》（半月刊）55期，发表论文、资料上百篇。还在《中央日报》《贵阳革命日报》《贵州农报》《贵阳时事导报》《妇女工作》《贵州教育》等报纸发表文章。

在编辑出版图书方面，社会研究部先后编辑出版了《民族学论文集》第一辑、《苗胞影荟》《炉山黑苗的生活》《贞丰仲家语字汇》《安顺苗夷的生活》《威宁大花苗语字汇》《贵州苗夷社会研究》等书。其中，《贵州苗夷社会研究》一书是社会研究部田野调查最有代表性也最具学术价值的成果之一。该书收录了吴泽霖、陈国钧、张少微、李振麟、吴修勤、杨汉先、张为刚、李植人、邝充等学者的论文五十一篇，其内容涉及贵州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文化教育、风俗习惯、地理分布、语言梗概和习惯法等方面。^①此书被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研究贵州少数民族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正如有学者所言：“《贵州苗夷社会研究》从出版到现在已整整过去六十年了。直至今日，本书对研究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文化的人

^① 上文有关大厦大学社会研究部资料参见何长风：《贵州近代少数民族调查研究的拓荒者——抗战时期大厦大学社会研究部的成就》，载《贵州民族研究》，2002（1）。

贵州民族研究六十年

来说仍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①

除调查研究贵州诸多少数民族情况、整理资料、撰写报告、论文、编印刊物、出版著作外，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还十分注重搜集各少数民族文物，拍摄各少数民族照片。据有关资料载录，社会研究部在调查过程中搜集到的各少数民族珍贵文物共有二千多件，包括少数民族服饰、生活用具、乐器、文字等；摄制各少数民族照片共有数百幅，涉及贵州少数民族的衣、食、住、工作、娱乐、婚丧祭祀等各类。^②社会研究部先后举办贵州少数民族文物摄影展览共三次。这三次展览在民众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每日参观者极为踊跃，无不兴趣浓厚，各方硕彦亦往参观，尤为赞许。”^③

综上所述，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对贵州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工作，是当时中国东南沿海大城市上海的大学教授、学者、专家到贵州后，第一次用崭新的、前沿的理论方法，从不同视角对西南少数民族所进行的全面的、综合的调查研究。其内容涵括了贵州苗夷概况调查、贵州苗夷民俗资料搜集、黔东南苗夷生活调查、北盘江流域苗夷状况调查、贵州各种苗夷语言调查等田野工作；其足迹遍及今日贵州的毕节、安顺、黔西南、黔南和黔东南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历时四载，对贵州的苗族、布依族、水族、侗族的分布以及各族历史、社会、文化、习俗、语言、歌谣、服饰进行了探索性的或专题性的调查，获得了大量的有价值的资料。可以说，他们的研究代表了当时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发展水平。因此，无论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都对日后的贵州民族学乃至中国民族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 学者个人对贵州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

国内学者对贵州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的于20世纪初就已开始，且成果颇丰。目前所能见到的国内学者发表的研究贵州民族的文章，首数1904年署名波公的《调查贵州苗族之情形》（刊载于《新民丛报》第3卷第5期）；此后有1917年庄启的《苗文略述》（刊于《东方杂志》第14卷第1期）；崔韵奇的《苗族考略》（刊于《地理杂志》第8卷第5期）；1920年芝轩泽的《苗族小史·历撒得牧师笔记》一文（刊于《小说月报》第11卷第3期）；1923年于曙峦的《贵州苗族杂谈》（刊于《东方杂志》第20卷第13、14期）。在1926年以前，发表的有关文章主要以苗族为主，有近十篇。^④

中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林耀华先生早年曾经研究贵州苗族。1937年，林耀华先生前往哈佛大学学习人类学，其博士论文《贵州苗民》（1940）依据了罗绕典等著《黔南职方纪略》，并综合中外文献，精确考证了贵州苗民52支系的分布地望，简略描述了各支系的服饰、饮食等风俗。为弥补战时不能做实地调查的缺憾，他还特将中外学者对贵州苗民的分类做成附

① 王建民、罗春寒《导读》，载吴泽霖、陈国钧等著：《贵州苗夷社会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② 参见柴聘陆：《参观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苗夷文物展览记》，载吴泽霖、陈国钧等著：《贵州苗夷社会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277。

③ 陈国钧：《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工作述要》，载吴泽霖、陈国钧等著：《贵州苗夷社会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273。

④ 参见陈国安：《民族学在贵州的发展历程及展望》，载中国民族学学会编：《民族学研究（第12辑）》，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188～189。